

文化视野中

的 汉代文学

张新科◎著

本書將漢代文學現象置於社會文化背景中，從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與經濟、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藝術等角度，對漢代文學的興衰、流變、特徵、影響等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探討。本書不僅是研究漢代文學的必讀之書，也是了解中國文學史、文化史的重要參考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文化视野中

的 汉代文学

张新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张新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978 - 7 - 5004 - 6000 - 8

I. 文… II. 张…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730 号

特约编辑 陈 林
策划编辑 陈 彪
责任校对 张选令 蒋海军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	-----

上 篇

第一章 汉代文学与先秦文化的不解之缘	(9)
一 文化因子的承传	(9)
二 文体形式的因革	(24)
三 士人精神的沾溉	(32)
四 文化经典的确立	(39)
第二章 大一统政治下的文人心态轨迹	(48)
一 汉初政治与文人的自我追求	(48)
二 政治一统与文人的盛世情怀	(57)
三 政治衰败与文人的多元心态	(68)
第三章 经学盛衰与汉代文学风格的变化	(85)
一 经学的兴盛与衰落	(85)
二 经学与文人的思想行为	(92)
三 经学与文学生成及文风变化	(95)
四 经学与文学批评	(104)
第四章 神学思想与汉代文学的哲学化思潮	(110)
一 “天”的神圣性	(111)

2 目 录

二 神学思想的确立	(121)
三 异端思想的出现	(126)
四 神学思想与文学创作	(131)
第五章 道家思想与汉代文人的自我情怀	(141)
一 道家与汉代文人的思想观念	(142)
二 道家与西汉文人的内心解脱	(148)
三 道家与东汉文人的自我安顿	(155)
第六章 神仙观念与汉代文学	(162)
一 生命意识与神仙观念	(162)
二 神仙观念与汉赋	(169)
三 神仙观念与汉代诗歌	(174)
第七章 风俗文化与汉代的杂歌谣辞	(184)
一 汉代风俗文化的意义	(184)
二 汉代杂歌谣辞的特征	(189)
三 杂歌谣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195)
四 杂歌谣辞的文学史意义	(199)
第八章 汉代艺术与文学的双向互动	(204)
一 音乐与汉代文学	(204)
二 舞蹈与汉代文学	(213)
三 书法、绘画与汉代文学	(219)
第九章 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	(225)
一 从《史记》看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	(225)
二 从《汉书》看汉代文学的自觉化倾向	(230)
三 《后汉书·文苑列传》的文学史意义	(233)

下 篇

第一章 依经立论：汉代人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241)
-----------------------------	-------

第二章	多元与整合：从《自序》看《史记》的文化 意蕴	(257)
第三章	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两位文学巨匠：司马迁 与司马相如比较论	(270)
第四章	经术与文学的结缘：《焦氏易林》与汉代的 四言诗	(278)
第五章	汉代道教经典与五、七言诗歌	(291)
第六章	诗化的艺术：傅毅《舞赋》的文化价值	(302)
第七章	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兼论汉末 文风的转变	(310)
第八章	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	(324)
结语		(345)
主要参考文献		(352)
后记		(356)

绪 论

汉代文学无论从创作实践还是从创作理论诸方面来看，都显示出不同于前代文学的性质、特点。总的来看，是政治化、哲学化的文学。非文学的因素贯穿于两汉文学的始终，同时它又具有文学自觉化的倾向，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文学”一词，在先秦时期泛指古代文献，为孔门四科之一。《论语·先进》曰：“文学：子游、子夏”。汉代的“文学”一词，基本沿用这一意义，指的是儒学及其他学术文化，如《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十一月诏曰：“选豪俊，讲文学”，这类例子很多。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则用“文章”、“文辞”等术语。因此，研究汉代文学应把握两层意思，一是当时的文学范畴，由其基本意义可以看出，汉代的文学包含许多方面，各种学术文化都在范畴之内，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二是站在今天的文学立场看，汉代文学属于文章之学，文辞之学，与我们今天的文学还不完全相同。有鉴于此，研究汉代文学时，我们既要关注文学，更要关注文化。

就汉代的“文人”而言，它既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士”，又不同于魏晋以后的纯文人。汉代思想家王充对文人的认识是：“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

2 绪 论

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①可见汉代“文人”的范围比较宽泛。王充有时也用“文儒”指文人，认为“文儒”，“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②可见，汉代文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这也要求我们在研究汉代文学时，不要局限于文章之士，而要关注更多的文化人。

关于“文”，自先秦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汉代对于“文”的认识仍然具有“大文学”的特征。如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五文”：“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③这些现象本身就告诉我们，汉代文学属于“杂文学”或“大文学”时代。研究汉代文学不能离开汉代的学术和文化。而且，就汉代人的文学观念来说，文学负载着哲学意义、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不是纯粹的文学审美。从文学发生学角度看，汉代文学的产生有它独特的文化土壤。大一统的时代，儒学定于一尊，经学的盛行，道家思想在汉初和汉末的流行，佛教的输入，社会风俗的变化，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汉代文学的文化学特征。

对于汉代文学的研究，以往较多的注重文艺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汉代文学的意义、地位、性质，绝不仅仅限于单一的艺术和审美范围。研究汉代文学，离不开文化学的环节和视域。从文化视野看汉代文学，首先就要理解文化的含义。“文化”一词很早就在中国古籍中出现，如汉代刘向《说苑·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谓不

① 《论衡·超奇篇》。

② 《论衡·佚文篇》。

③ 同上。

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代束皙《补亡诗》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但中国古代的“文化”语词指的都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我们现在通用的“文化”概念是外来语的意译，相当于英语的 Culture 和德语的 Kultur，而英、德语的该词又由拉丁语 Cultura 转化而来。发展到今天，世界范围内关于“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多达 160 多个。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共同撰著的《文化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书中，对西方流行的 160 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了回顾与评析，并将其列为六大类型：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①。这些文化类型对于人们认识文化内涵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在当今众多的关于文化含义的理解中，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大类，如张岱年等先生认为：“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等。……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既包括像哲学家的著作、文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类的物，也包括科学技术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在我们看来，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和人关系的方面，以及人自身的关系——如灵与肉、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面。”^② 简略地说，文化有着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许多方面。总而言之，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

① 详参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3—225 页。

②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 页。

产品。文化具有时代性，而且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所以，从文化视野看汉代文学，就是指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从哲学、宗教、艺术、风俗等广阔的角度认识汉代文学，其本质仍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

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汉代文化，就其最核心的内容来说，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核心的文化，它对于汉代的政治、文学、艺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汉代文人的思想根基里，儒家的社会理想、政治信念、人格理想等占据重要地位。在汉代，经学又与儒家文化紧密相连，形成了汉代文化的独特风景，文人皓首穷经，以毕生的精力读经解经，给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汉代文学，应抓住汉代文化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探讨。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

近年来，随着对汉代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汉代政治、汉代经学、汉代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等，如万光治《汉赋通论》^①、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②、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③、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④、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⑤、冯良方《汉赋与经学》^⑥等。但相对于两汉四百年辉煌的文化来说，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入。

鉴于学术界对汉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笔者拟将汉代文学放在两汉四百年间文化变迁的视域中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

① 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

② 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④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张松辉：《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⑥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握汉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其特征，并且从文化演变过程中考察汉代文学如何逐渐向文学的自觉时代迈进，勾勒汉代文人心态变化的历史，挖掘文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从而较全面客观地揭示汉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一般文学史著作中所论述的汉代文学还有许多的弥补空间。例如，汉代易学的重要著作《焦氏易林》，其中有四千多首繇辞，基本上是整齐的四言诗，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四言诗在汉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汉代道教的重要著作《周易参同契》、《太平经》中还有一些五言诗句和七言诗句，它们可以补充汉代诗歌史链条中的一些缺失的环节，这些哲学著作中的文学作品，长期被研究汉代文学的人所忽略；再如汉代的“谣言”，在汉代诗歌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往往也不被重视。还有，我们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很少关注汉代的画像石（砖）、歌舞等艺术，实际上这些艺术的发展对汉代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我们认识汉代文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的研究视野只局限在纯文学的范围内，就很难全面认识汉代文学的真正面貌和特征，很难全面把握汉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汉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大文化”的视野。

从文化学的视野研究汉代文学，除了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外，更重要的是以汉代文学作品的实际为出发点。离开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问题就会出现偏颇。刘勰《文心雕龙》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①作者因情而创作，读者因文而入情。我们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可以透视作家的心理世界，也就是说，“作品蕴含着文化密码，也蕴含着作家个人心灵的密

①（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

6 绪 论

码。依赖文本及其叙事视角，进行逆向思维，揣摩作者心灵深处的光斑、情绪和疤痕，乃是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①因此，我们将从汉代的文学作品出发，去挖掘汉代文学的文化意义，窥看作者的心魂。为了突出研究主题，本课题以专题论述的形式，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透视，就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而不是全部的汉代文学史，也不是整个的汉代文化史。比如，汉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本文主要着眼于在大一统政治下文人心态的变化特征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而不是全面论述汉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同时本文在相关论述中注意将史的线索融入其中，尽量展现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期望通过这样的努力，能够较全面深入地认识汉代文学及其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书稿中所引用的古籍文献，在最后的“参考文献”中统一注明版本，文中不一一详注，以节省篇幅。

^① 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页。

上 篇

第一章

汉代文学与先秦文化的 不解之缘

汉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无疑是与汉代的社会土壤有密切关系，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对汉代文学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论述。本章主要从文化渊源上分析汉代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基因。笔者认为，汉代文学与先秦文化有不解之缘。先秦文化的浸润，是汉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从文化因子、地域特色、文体嬗变还是思想人格、文学精神等方面看，汉代文学都深深地打上了先秦文化的烙印。

一 文化因子的承传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开端，当时的文化有多种形态，如果从文化演进的大背景看，主要有三大系统：巫文化、史官文化、子文化^①。汉代文学的产生发展与这几个文化系统有密切的关联。

^① “文化”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文化类型各式各样，也有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的。这里所举只是精神文化的重要方面而言。如果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先秦文化还有部族文化、乐官文化、礼仪文化乃至不同风格的地域文化等多种形态。

巫文化是中国古代各种文化的源头。它产生于原始时代，以神为主体，是人类早期思维的集中体现。人类诞生以后，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无法战胜各种自然灾害，于是就幻想出各种各样的神灵和魔力，以超人的力量降伏灾害。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神支配着世界，支配着人的行动。上古神话故事就是这种文化的形象反映，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 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人的自身价值得到认识和肯定，巫文化也开始逐渐转型，向以人为主体的史官文化过渡。所谓史官文化，是指上古三代到秦汉时期以史官为代表的知识人士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以现实为基础，以人伦为本位，注重“隆礼”、“敬德”，它由巫文化发展而来。由巫到史，古人也早已注意到了。《国语》记载了这种演变过程：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兴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② 《国语·楚语下》。

这条资料清楚地说明：（一）巫的产生乃是为了沟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关系；（二）巫者必须具有某种非凡能力，是人类中的精英；（三）颛顼之时，命重司天、黎司地，天地、人神之路隔断，重、黎氏世叙天地；（四）西周时，原来的天官、地官“失其官守”，成为司马氏。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①。

一般把这段话看成司马家族的历史，实际上它何尝不是中国史官文化的发展历史呢？由天官到史官，线索分明。这与上引《国语》的一段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两条资料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是史官文化的一个转折点，史官的职能向人事逼近了一步。此前的原始先民时期，巫史一体，巫掌管着沟通天人的职能，地位十分重要，即使殷商时期，虽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但史官的天官职能未有变化。这样的变化还可以从其他文献得到印证。

《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甲骨卜辞卜问的内容以有关自然神祇与祖先的祭祀为最多。据陈梦家《殷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